



宋代壁画墓与《白沙宋墓》

——纪念《白沙宋墓》出版五十年



陆锡兴 (南昌大学人文学院)

1951年到1952年修建白沙水库,考古工作者积极配合土方工程,抢救发掘库区的古代遗址和墓葬。宿白先生主持了河南禹县白沙镇三座宋墓的发掘工作,1954年发掘报告的正文大致完成。同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“全国基建中出土文物展览会”展出了白沙宋墓的壁画摹本,公开了这个重大发现。“禹县白沙的宋墓壁画,虽艺术价值不高,但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地主们的日常生活^①。”这寥寥数语指出了这次发现的墓葬的丰富内涵,表达了考古界给予的充分重视。《白沙宋墓》发掘报告经过多次加工,于1957年9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,此书问世,受到普遍欢迎,可惜印数只有1520册。过了几十年,更是难觅踪影,因此文物出版社在2002年4月重新出版,改为较小开本,内容作了局部的调整。《白沙宋墓》之所以为人重视,不只是墓葬内容的重要性,更是报告的经典性。该报告以其全面的科学价值、丰富的资料、优良的印刷装帧引得学术界的赞誉。

白沙宋墓由三座家族墓葬组成,一号墓东壁“元符二年赵大翁”纪年题记以及地券所载“大宋元符二年九月”,明确其年代为北宋哲宗元符二年(1099年),二号墓、三号墓没有纪年文字,根据墓葬实物比较,确定二号墓稍晚于一号墓,三号墓又晚于二号墓,

后二墓大约在徽宗时期。白沙宋墓是砖雕壁画墓中保存较好、结构最复杂、内容最丰富的一组墓葬,其中尤以赵大翁墓最为完整。宋代的砖室墓流行于北方,历史并不久远,是唐代、五代才发展起来的墓葬形式。中原地区的宋代砖室墓有两个特点,一是仿木结构,一是壁画。仿木结构并不是单纯用绘画来表现木质构造部分,而是用砖雕加彩绘的形式来仿造木质的建筑构件和家具用品。敦煌发现唐代砖室墓中仿木窗棂门户,这是现见最早的仿木结构,但它在唐代并不流行。完善的砖室仿木形式在宋元德李后墓发现,墓室内有仿木砖砌单昂四铺作斗拱,北壁砖雕假门、假窗、桌、椅、灯檠、衣架。这些砖雕先刷白粉,再施彩色。墓壁原来还有宫室楼阁壁画,可惜已经损坏殆尽。元德李后葬于北宋前期咸平三年(1000年),正如整理者指出,这是已见有宋代纪年墓使用仿木建筑砖雕壁画时代最早的一座^②。北宋中期到后期此类砖室墓成为民间的墓制,形制逐步由单室墓发展为双室或多室墓,方形或圆形发展为多边形。墓室的仿木建筑越来越复杂,五铺作、六顶藻井、雕花隔扇等逼真的式样成为风尚,砖砌家具杂物错落其间。壁画的各个墙面各有分工,主人安排在主要位置,主人周围仆人围绕,乐工、杂役安排专门场

面,整个墓葬成为墓主人在世生活的缩影。墓主夫妇两人袖手对坐椅子,足踏踏子,中间安桌。桌上放酒注和酒杯。后面一男仆捧唾盂,一女仆捧奩盒。桌下有风炉,炉上有酒瓶。男女主人尚在青年,体态微胖,神态安详(见图一)。宿白先生根据宋罗晔《醉翁谈录》



图一

描写的情景,引用该书的“常开芳宴,表夫妻相爱耳”,定名为“开芳宴”^③。“开芳宴”这个说法后来为部分人接受。古代社会的事物常常有它的特定含义和背景,用当时的名称命名,这个原则是应该坚持的。墓主人开芳宴的场景有几点值得注意,首先是墓内设像的问题。墓内设像的风俗由来已久,早在战国已经流行,长沙东南郊陈家大山楚墓帛画有高髻细腰,长裙曳地的女子像,长沙子弹库楚墓帛画中高冠广袖的男子像都是例子。长沙马王堆第一、三号墓以及山东临沂金雀山九号墓均发现墓主人像帛画,汉晋墓葬还发现多处官员持节画像。北齐徐显秀墓内壁画夫妇像,右手持杯,据床而坐,周围陪伴众多侍侯仆人,是目前看到最清晰的墓内设像。成都前蜀永陵在后室正中的石床上置王建石雕像,为仅见的五代设像(见图二)^④。宋代砖室墓流行设墓主像。宋哲宗“绍圣四年”(1097年)纪年的河南登封黑山沟北宋八角形壁画墓内,有备宴图、伎乐图、宴饮图、育



图二

儿图、侍洗图和孝子图。男女墓主人对坐在椅子上,中间桌子,背后各有座屏(见图三)^⑤。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古人的人物造型都是写意作品,因为墓葬内的俑人形体雷同,表情呆板,同时足以证明人物写实的绘画作品不



图三

多。直到秦陵兵马俑的发现,才改变了看法。秦陵陪葬坑的兵马俑数量众多,但是其中人物雕塑水平高超,栩栩如生。最值得注意的是人物的面容各具个性,推测都有模特的依据,反映了秦代人像形象的写实水平。宋黄休复《益州名画录·妙格中品》载唐、五代的一些画像高手,其中常重胤绘唐僖宗像,形象逼真,“御容一写而成,内外官属,无不叹骇”。常重胤后留至前蜀,为蜀主所用。王建石像实物“隆眉广颡”与史载一致,可以证明史载写实水平可信,而王建石像很可能是常重胤的作品。宋代多有以画像出名的画家,北宋末年邓椿《画继·人物传写》中李士云、朱渐、徐确等属画像高手。当时以写真传神就是以写实为标准,这与当时写影和影堂制度的兴起有密切关系。设像之所在唐宋时期称之为影堂,始见于唐代,大致在北宋中晚期在民间流行开来。大家大族有专门设影的厅房,大者如宗祠,小者如家堂,有的设在寺庙之中,在门口有书有影主的名讳。宋代的影堂制度在笔记小说有所反映,影堂内陈设遗影,遗影采用写实绘法,忠实于本人的面貌。前蜀永陵王建石像说明墓葬实际就是一个影堂,宋元一些设像墓葬都是影堂。宋代砖室墓葬一般在一侧墙面画出房门,虚拟了墓室之外还有房间,实际是前堂后室的制度。登封黑山沟北宋八角形壁画墓和白沙一号墓年代相隔仅二年,地望相近,二墓开芳宴的情景几乎相同,是一种程式化的安排。但是比较男主人面容,一个短脸、一个长脸,眼睛眉毛鼻子都不同,一个额头有明显皱纹、一个脸面光润,显示出是富有个性的写实绘画。还有一个细节,王建和两座宋墓墓主身分相差悬殊,可是石像和画像的服饰是相同的,从幘头到圆领袍子完全一样。王建和赵大翁袖手而坐,两手相合叫拱手,拱手而自然下垂叫垂拱。垂拱在中国古代有特殊意义,《尚书·武成》:“惇信明义,崇德报功,垂拱而天下治。”唐孔颖达注云:“手无所

营,下垂其拱。”垂拱而治是帝王无为而治的象征,赵大翁沿用了这个标准像,有太平安宁的意味。这些也是五代以来标准像的内容。赵大翁的开芳宴有一个很特殊的制作方法,所有的壁画中唯有男女墓主以及所用的椅子、桌子、注子、台盏是砖砌突出的浮雕,这在宋代平民墓葬中绝无仅有,不过五代墓葬却有浮雕的人物。河北曲阳五代壁画墓甬道的十六个壁龛十二相属汉白玉浮雕像,在后室也镶嵌汉白玉浮雕,西壁为女子组成的散乐图,东壁为侍奉起居的侍女图,这些浮雕均加彩绘十分精美^⑥。墓葬的墓室浮雕是从石棺床的浮雕发展而来,但是作为平民的赵大翁彩绘浮雕还是很少见的。总之,宋代砖室墓的墓主形象给我们展示了许多写影具体内容,有助于了解宋代影堂制度。

我们国家历史悠久,古代遗存丰富,但是大部分被简单处理了。例如与白沙宋墓几乎同时发现的山西平定宋末砖室壁画墓,整理报告就非常之简单。平定县东回村宋末元初墓葬在1950年发现,墓中的文物被群众私分。此墓为砖砌八角单室墓,砖砌仿木建筑,有角柱、普柏枋,斗拱卷杀四铺作,周壁有雕刻、彩绘装饰,后壁为正室门,东西两壁各雕门框,东北壁画出男女两主人对饮,六个男女仆人环立后面。西北壁画厨房和厨工,西南壁画马厩,东南壁画牲畜栏,内有牛、马、羊、猪、鸡、马厩及牲畜栏上方皆雕刻窗,窗作贯线钱图案。1954年山西省文管会派人整理,可惜短短的报告把大量重要的信息吞没了^⑦。此类不完整的考古一直存在,究其原因,一是认识水平,无意中把“没用”的东西忽略了,一种是工作草率,急于完成报告,再有一种可能是故意留一手。《白沙宋墓》拿出了客观全面的记录,如果没有此书出版,白沙宋墓就会像其他大多数墓葬一样湮没无闻。可以说白沙宋墓的重要价值只有通过宿白的《白沙宋墓》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,报告所保存各种详尽的、完备的文字和

图片资料,给后人继续研究的可能,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提高还能发现更多重要的内容。这是宿白先生《白沙宋墓》著作的一大贡献。

《白沙宋墓》不是一种普通的发掘报告,它同时是高质量的研究著作。报告在叙述事实的基础上对墓葬的重要内容作出了可靠的考证。介绍三座墓葬之外有专门研究,就墓葬年代、三座墓葬关系、墓主人的社会身分、墓葬的构造等进行了分析和研究,这是墓葬基本情况的报告,是大部分考古报告都必须回答的问题,这并不是本书的特别的部分。我曾经说过:“此书最大特点是正文与注文并重,即把考古叙述和文献考证的内容分开,前者在正文中交代,后者放在注释里说明。正文中提到的古物名称,在相应的注释中大量引证。”宿白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,付出了几倍于同类考古报告的努力,这是值得的,他开创了一个充分利用文献进行考古研究成功的典范,使中国考古学得到提升。

⑧“考古与文献结合体现了古代文化的一致性,两者相互联系,相互补充,都是研究古代社会必须的信息渠道。其实注释中引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只是一个方面,报告同时引用了大量有关的考古材料和当代科学研究成果。例如“墓壁设窗棂”一条,引用了当时发表的东汉画像石、敦煌唐墓等三种资料⑨。“夫人启门”一条,引用考古以及古建筑资料19条,并且引用4条文献资料。“家具出现和陈设”一条近3000字⑩,带有简单扼要论述的有关资料,是一篇家具简史。这样的注文全书竟然达到245条,注文的丰富资料性,徐苹芳先生已经有了精彩的论述,我以前的文章也有论述,在此不再一一赘述。以前考古和文献研究是分家的,考古依照西来的传统,关心地层、类型,不关心文献。这种形式在考古报告中看来比较陌生,却体现我们前辈治学的优良传统。古代的重要典籍,如唐人和清人对儒家经籍的注疏,阐述微言大

义,注文的篇幅超过经文是常有的事,经文和注文融为一体,都是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近代历史学家王国维开拓了学术研究方法,注重新发现,把乾嘉学派的传统考据和地下新材料结合起来,创立著名的“二重证据法”,成为现代学人的治学新境界。1949年以来,这个传统依然有人继承,发扬光大。科技史研究者胡道静在1956年春天,“把《梦溪笔谈校正》搞出来问世了”⑪。此书注文除了作文字校正外,广引博证,从古代文献到科学发现,其篇幅远远超出沈括《梦溪笔谈》的正文,而且注意引用古籍内容的完整性,一般引用一个段落,甚至一个小节。宿白的《白沙宋墓》著作几乎同时进行,同样是用注文的形式大量地引用古籍和同类成果,不过因为内容不同,宿白还引用了不少古代绘画资料,形式上更加多姿多彩,更加直观。这样的做法有明显的优点,提供多方面的材料使得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。读者通过阅读报告不仅了解作者的观点,也可以利用材料作进一步探究的桥梁。这些资料中不乏难以寻觅的图书和绘画,原样呈现使得使用者省去翻检之累,求索之苦。在当时考古界基本不具备文献意识的情况下,这样的注文是十分必要的。

《白沙宋墓》无疑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,是考古报告的一个典范。它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。首先报告“一定要客观地、忠实地、完整地(不能隐瞒遗漏)发表科学记录,这是一个有良知的科学家必备的学术品德。”⑫“要求文字部分表述明确完整,考古发掘整体上的记录,具体细部微观的描写。其次图版对于考古成果传递具有特殊的作用,也要做到完整、完备,要尽可能地清晰,采用适当的摄影和手绘图,使得在出版物中显示出最佳的效果。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我们的考古报告这方面做的很差,插图太少,而且大部分模糊不清。

中华民族具有几千年沿用的汉字,文献

记载完整,历史文献相当丰富,它是考古研究不能忽视问题,也是考古报告中的必须具备内容,适当地引用有关的历史文献同考古成果一样,应当成为考古报告的有机组成部分。正确地引用文献至少可以解决两方面的问题,首先是称名问题。中原地区的古代文物,绝大部分具有相应的文献记载,这些记载详略不一,但是称名可以找到。这样可以避免我们根据主观的认识,随意起名,用一个词组取代固有的名称,或者用一个现代通名取代古代的专有名称。同时,这些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出土文物的背景资料。某一墓葬的出土物是一个例子,它的信息相对缺乏,如发展源流、使用范围,这些内容往往在文献中可以得到补充。考古发掘报告的内容以本次发现的文物作为对象,文献是研究实物情况的必要手段。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器物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,初具规模,大部分常见器物皆有一定研究成果。报告没有必要繁复引证文献,而且篇幅不能太大,应简明扼要,不蔓不枝。文献不必自成系统,不宜繁引,以免喧宾夺主。行文中的证明文献材料如果没有必要,一般不宜与正文分开,以免行文不畅,文、注往返阅读带来不便。报告不同于专题文物研究,墓葬中涉及面很大的出土文物不可能在一个报告内解决全部问题,报告也不可能取代专题研究。根据“绪言”所介绍,宿白先生当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古器物研究室工作,“文中大部分插图与附注,原是整理记录以前所收集的有关参考资料。”^⑬《白沙宋墓》是特定环境出现的特例,资料庞大而且全面,采取放在注释之内是理想的选择。《白沙宋墓》的精神是重视文献和关心有关的研究成果。宿白之所以能提取这么充分的资料,依靠的是扎实的资料收集工作、长期深厚的知识积累,这是我们

需要努力的方向。

写于2007年12月,作者谨记。

注释:

① 夏鼐:《缙理发掘与考古研究》,第62页,图版67、68,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4年第9期。

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巩县文物保管所《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》,《华夏考古》1988年第3期。

③ 宿白:《白沙宋墓》,第33页注释53,文物出版社,1957年。本文所据皆此版本,以下不一一注明。

④ 温廷宽:《王建墓石刻艺术》,第13页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85年。

⑤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、登封市文物局:《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》,《文物》2001年第9期。

⑥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、保定市文物管理处、曲阳县文物管理所:《河北曲阳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》,《文物》1996年第9期。

⑦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:《山西平定县东回村古墓中的彩画》,《文物参考资料》1954年第12期。

⑧ 陆锡兴:《金石学、考古学到古代器物学》,《南方文物》2007年第1期。

⑨ 宿白:《白沙宋墓》,第18页注释31,文物出版社,1957年。

⑩ 宿白:《白沙宋墓》,第97~99页注释230,文物出版社,1957年。

⑪ 胡道静:《梦溪笔谈校正》附录一,第1页,《梦溪笔谈校正五十年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。

⑫ 徐苹芳:《重读《白沙宋墓》》,《文物》2002年第8期。

⑬ 宿白:《白沙宋墓》,第1页,文物出版社,1957年。

(责任编辑:周广明)